

文学现场

以赛先生之眼：科技与人文对话的 N种可能

——关于李静《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的
对话（节选）

李 静 刘大先 陈济舟 徐 刚 等

摘 要：2024年12月29日，北京中间美术馆与三联生活书店联合举办“以赛先生之眼：科技与人文对话的N种可能”学术工作坊，并同步线上直播。本次工作坊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李静副研究员的专著《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为基础，由八位文学研究者延伸讨论人文与科技的互动关系。在工作坊的交流中，研究者就人文对话科技的视角与挑战、新人文的独特价值与跨学科性、“文”的虚构性与叙事力量、科学文化的历史脉络与当代经验等多方面的话题发表见解，探索了从人文角度进入科学文化的若干言说路径。

关键词：《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新人文；历史；人心；批评新生态；文化参与

一、视角与挑战：人文对话科技

李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感谢中间美术馆与三联生活书店策划、组织本次工作坊，以我的专著《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以下简称“《赛先生在当代》”）为基础，延展出以文学视角思考人文与科技互动关系的相关议题。当前一边是科技狂飙突进，关于AI的讨论铺天盖地；另一边是人文学科危机论成为共识。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

们今天的讨论应当更多致力于反思与挪动已有的知识边界，让更多可能性浮出水面。作为引言人，我的发言主题是“视角与挑战：人文对话科技”，以此总结《赛先生在当代》的写作与出版交流带给我的启示。

先谈四重研究视角。第一重视角是科学的社会化与文化化，这也是拙著采取的最基础的研究视角。这一视角之所以成立，与科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密不可分：其一，科学的整体性，1895年前后，科学概念确立下来并日益发展为一个巨无霸概念，逐渐囊括科学研

究、政治实践、信仰道德、科学的技术化、技术的科学化、科技一体化等多个层面,科学的含混性、整体性与包容力,使得它具备强大的实践转化力;其二,科学的道德化与人文属性,以现代常识理性建构出新的道德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我抓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化符号“赛先生”作为题眼展开思考。为什么要选择“赛先生”而非“科学”进行讨论呢?因为“赛先生”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概念的文化再造,典型地体现出科学的文化属性,而且它与德先生、穆小姐、费女士等的关系,也能勾连出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复杂光谱。我在书中尝试讨论赛先生走出实验室后,进入各种社会场景所激发的效应与故事。尤其是进入当代中国后,赛先生变身赛同志,面临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要将一切都回收进文化,而是力图打破科学的排他性,将之重新放回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结构和历史脉络里面,使得我们这些科学共同体的局外人,也能够批判性、反思性地讨论和理解科学。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研究视角,也是一项愈来愈重要的文化权力。

第二重研究视角是科学的叙事系统与文学形式。在此不妨借用现象学家舒尔茨(Alfred Schütz)的说法,社会科学家更多关注的是思想的世界,而文学则关注我们在其中行动、在其中生与死的世界。《赛先生在当代》所关注的文学世界,分别来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与 2016 年所谓 AI 元年以来的当代文学新变。在前一时段,文学变身科学合法性的游说者,同时也保留了游移与质疑的空间;在后一时段,科学已不需被证明,而是下沉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重塑了生活方式与表达方式。其中,我尤其关注人们选择何种文体、语体去表达科技带来的冲击。比如,新时期文学为何迅速启用报告文学这一体裁去塑造科学家英雄,当下为何会以科幻文体去展开思想讨论,科学故事又是如何激起社会反响与情感效应,等等。通过此番研究,我想探索科学故事的认知价值,包括对情境化、差异性的尊重,对民情民心的穿透,对于欲望与想象模式的呈现,对权力结构的反思,等等,甚至在文学的无能为力之处,恰体现出现实

的幽微与复杂。这些认知价值并不逊色于常见的科学史、科学制度、科学哲学等相关研究。饱含时代经验的文学故事能够与相关学科的研究互相辅助、彼此照亮。

第三重研究视角依然是从文学立场出发,关注互联网媒介上的文学读写。近年来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关于网络文学、数码文化、媒介物质性等研究都有长足进展,我更感兴趣的话题则是互联网上的语言形态,大众的书写模式以及阅读模式的变化,这些都体现在下编的具体讨论中,尤其集中在“诗歌”这一最具文学性的文体,以及“名著”这一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上。我试图以这两个最稳固的“支点”,去观察数码技术带来的冲击,具体讨论了 AI 写诗、微信读诗、弹幕版四大名著、互联网鲁迅等。这里稍举一例,比如论及弹幕版四大名著,便会涉及本真性、口语化、社群感、因果性与历史感被共鸣取代,趣味性、套路化、暴力性等读写模式特征。在此过程中,我的最大收获是要勇敢地以个体经验去越界。算法、大模型对普通人来说是黑箱般的存在,我们所拥有的则是作为用户的丰富体验,以这样的体验去跨越科技与人文的鸿沟,学习去观察、表达自己各方面的体验,是一项有生产性的工作,能够产生有价值的讨论。

第四重研究视角是数字时代的精神生活。在这些文字表达的背后,其实是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组织方式的变化。这是我写作中有朦胧感知,而在出版后与大家的交流中才更加明确的问题意识。今天又来到科学与人生观的充满张力的时刻,越来越多的“理性人”开始投入玄学的怀抱,以之为媒介去认识自己,寻求自我表达与重塑的途径。这似乎与百年前的科玄论战构成遥远的呼应。在科技深入到语言、想象力、无意识的今天,我们必须再度去追问,机器是新神吗?科技与人的关系、界限是什么?如何看待未来的人机关系?而在此过程当中,人为何持续性地降格,身心遭遇多重冲击,生命力极大降低?为什么人越来越成为类同于机器的标准件?我认为这一系列追问是极其必要的,人文学者必须去回应时代的精神状况和伦理状况,不只是去追溯漫长的当代精神史,也应该高度聚焦于当下变动中的经验。比如,《赛先生在当

代》里涉及“人拟机器”的问题,为何人会孜孜不倦地模仿机器写诗?这就涉及自由、主体性、信念、欲望、倦怠感以及人际关系等多重维度。我相信年轻一代学人可以基于当下经验作出更多原创性的阐释。

以上是我在《赛先生在当代》中尝试的四重研究视角,接下来还想谈谈人文对话科技面临的四重挑战:第一重挑战便是历史与现实如何关联。人文学者通常是依据文本与历史脉络来展开研究的,当我们试图把前技术时代或者把革命时代的经验,转接到当下经验时,经常会有种隔靴搔痒之感。比如,我对社会主义文化中的科普、群众科学经验很感兴趣,但是这样的经验很难直接转化为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案。我们一方面无法弃绝历史经验,认识当下必然要追索脉络,但历史经验本身又错综复杂,也不乏失败的部分。因此,我们到底如何去言说、传递、转化历史?

第二重挑战是分化的现实与言说的局限。不得不承认我们处于脑体隔绝、阶层分化、生活世界彼此区隔的状态中。精英知识分子在言说当代的科技现实的时候,经常会面对“何不食肉糜”的指责。人文学者如何才能跳出个人视角的局限,尽可能获取生活实感,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重挑战来自结构和自我之争。批判性地分析现实,往往会将整体性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为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人文学者尝试去说服普通人在大结构无法变革的前提下,改变自身身心状态,以便更好地去适应现实,这是否是一种逃避,一种保守的退让?但如果只把原因归结到结构性的霸权力量,那么个体的行动与调适,是否还足够重要?个体又该如何自处?

第四重挑战,便是应然与实然,或者说形而上理想和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人文学者必然会带出超越性的、形而上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是不及物的,某种程度上近乎“无用的感伤”,大家更需要实用的建议来提升生命质量。但反过来看,如果一切都以此时此刻的实用主义为先,渐渐地彼岸理想就会黯淡,想象另一种可能是否会越来越丧失合法性?而没有未来的愿景,还能够过好当下吗?这是我观察目前人文对话科技时遭遇的四重挑战。以上便是我的引言,期待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二、拥抱变化,建设“新人文”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静的《赛先生在当代》选题十分重要,我推荐给了不少朋友。关于从书中延展出的人文与科技对话的可能性这一话题,我想讲三点。

第一,科技、人文、宗教,我们都可以视之作为一种认知形式。从宗教到科学便是认知范式的转变。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技术垄断》认为任何一种工具在人类发展史上都起到很大作用,我们不能陷入新时代的卢德主义中去,比如随着智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无人驾驶可能是未来的一大趋势。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物质层面抵制,而是必须拥抱这种变化。我不认为这些变化会给人文带来多大的损害,它只不过是跟此前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有了很大区别而已,这可能是我们时代的“新人文”。2018年左右,我开设了一个专栏,后来结集出版为专著《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写作时相对处于朦胧的感觉状态,到现在感受愈发明晰了。

这就涉及我想说的第二点,当下的时代迎来科技与人文的整体性文化融合。这种融合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仅是科学技术跟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融合,还涉及生命政治与精神政治的融合,资本与政治的融合,等等。我看李静也引用了韩炳哲的书,他就论及生命政治的相关问题,这就带来一个“新存在主义时代”。所谓“新”,是指之前那种表象与本质的二元论认知模式可能已经失效了,现在更多的是所见即所得,语境与文本合一,无法脱离语境来抽象讨论一个文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风行一时,此后讨论文艺产品、文艺作品几乎都不可能脱离语境孤立地去看,许多东西是杂糅在一起的,《赛先生在当代》里的互联网鲁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来谈论人文学科从业者何去何从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说人文学科的衰败,但边缘状态才是常态,它从未成为过社会的主流。但人文的独立价值在于,人永远不能被科学实验彻底还原,并不会像巴甫洛夫的狗那样,完全是应激反应。现在没有科技背景的人

特别喜欢讨论 AI,在奇点到来之前,科技还是属人的工具。无论科学技术乃至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它解决不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工具理性无法还原非理性的东西。人带有他的感性方式,带有他含混的语言,无论何种表述都是有破绽的。他除了有理性的部分,有功利的考量,还一定带有非理性和本能性的东西。人的偶发性与这个世界的偶发性是齐头并进的,这些东西无法被科学认知,至少现在的认知科学无法破译。世界本身也是这样,庞杂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流变和偶然。这就使得科技不能完全解决人文的问题,人文学科其实有着巨大的空间,关注人的幽微情感与经验质感,这是目前的技术所无法取代的。当然我也承认一点,人自身的赛博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已经赛博格化了,手机就像我们的一个器官一样。一个孩子从萌芽到出生,现代医学技术从胚胎时期就已经介入他的生命,后面的成长过程也是不断被改造的。人的活力所在,就是他的接受弹性是极大的。

因此我想提的第三点就是拥抱变化。拥抱变化的同时,要警惕信息壁垒与技术鸿沟。李静刚才讲到群众科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社会主义早期的实践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去重新阐发的,比如说赤脚医生手册、军地两用人才指南,这些东西实际上有着重要的科普作用,带来技术的大众化。不过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也可能带来认知能力下降的问题,像是现在说的“抖音脑”。

我觉得最核心的命题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不能低估受众本身的反叛性和挑战性,比如《人民的名义》播出后,观众对祁同伟的“胜天半子”产生共鸣。其次就是眺望远方与关注附近的问题。在年轻人当中,虚拟经验、间接经验远大于他的直接经验和肉体经验,如何回到附近就成为问题。最后,接续传统后如何回到未来。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即如何拓展共同体。社会主义初期的文艺就是使得被少数精英统治阶层把控的技术与文化向一切民众敞开,向所有阶层族群性别敞开。同时包括文体、文类、审美风格在内的文化形式也在不断扩大,将民间的、传统的、大众的文化都吸纳在内。这是值得重视与重新阐释的。

秦兰瑀:(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我们今天的讨论一个来自科学研究界的人都没有,我原本担心讨论会变成“自嗨”。但李静的开场白回应了我的疑问,《赛先生在当代》提供了一种以社会化、文化化的方式进入对话的可能性。

老实说,我刚看到书名的时候其实有点困惑,因为从我的生命经验中长出的问题意识可能恰恰是“赛先生为什么不在当代”,赛先生何以无法真正做到社会化。我觉得书中处理的很多材料,其实也完全可以围绕这样一个相反的提问方式展开,这可能是一种更加符合我此在当下经验的提问方式。

我们需要区分“赛先生”是谁。毕竟,西方的“赛先生”也有很多传统,纯理论的、实验的、博物学的,等等。所以我们需要先说清楚“赛先生”是谁,这样才能更好地知道它传入中国后应对哪些问题。“李约瑟之问”提出,中国为什么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其实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缺乏一种理论科学的传统。说起我们古代的技术,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鲁班,鲁班会变成鲁大神,会变成祖师爷,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各种各样的技术到最后都变成某种“神话”。我们的文化和西方诞生赛先生的文化传统有很多根本差异,造成引进赛先生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本土制度和文化土壤。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一天到晚骂泰勒主义,泰勒的“科学管理”常被误解为一套量化技术指标,他为了回应这种误解,写了《科学管理原则》,目的就要把科学管理背后的“哲学”讨论出来。科学管理不仅是一套技术指标,也有配套的哲学和制度作保障。比如,泰勒设计的科学管理体系需要有管理者去培训师傅,其中的管理者和工人的数量几乎是一样多的,管理者和师傅的关系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帮助的关系。但是后来这套想法为什么落实不了?因为不太可行,聘那么多的管理者很花钱,所以人们干脆就把它简为一套量化的指标推行下去。科学管理最初也是有理想的,涉及更平等的组织制度和组织文化。但是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制度、文化却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和倒退。所以我特别好奇,与科学配套的文化与

制度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在阻碍与科学配套的制度和文化的的发展?

最后,我再基于自己的经验,谈谈对科技对话人文的看法。我博士毕业之后先在一个单位从事了7年信息化建设,做这个工作不得和程序员混在一起,这段经历最初我不太适应,但不久它就打开了我的新视野。这源于这样一个经历,当时我们要建一个书法美术库,我们领导有个想法:搜索书法作品的风格。比如输入一个王羲之的“王”字,搜出来的不是所有的“王”字,而是所有王羲之风格的字。也就是说,我搜的不是文字的“内容”,而是书写“风格”。如何实现这个想法呢?我后来找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谭铁牛教授,他把汉语笔迹识别做到了世界顶尖水平。我写信给他,说如果把笔迹识别的对象改成软笔的笔迹,是不是就能识别书法风格?他很赞同我的想法。后来我还见证了他和邱振中老师围绕“书法风格”一次的对话。这次对话对我的冲击特别大,我发现,说起“风格”,我们的语言不必只有“潇洒散逸”这样的形容词,或者“龙跳天门”这样的隐喻。“何为风格”这个问题,也可以在算法的语境中提出。后来我意识到,今天的很多问题,包括何为因果,何为作者,何为风格,何为故事,这些其实都是“跨学科”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方式,提供人文学科最独特的资源,共同促进跨学科问题的研究。

三、重思“文”的虚构性与叙事力量

陈济舟(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李静老师在引言的最后谈到,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是否还能够去想象面对困境的解决办法。学界近几年关注推想型现实主义(Speculative Realism)的力量,恰恰展示了想象与推想的重要性。未来以语文学为方法的科技想象将展开多维度的可能性,会形成一种叙事的力量。不管是科技的发展还是政策的制订,都会浸润在一种从文学出发的叙事力量之内。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反思文科衰败的境况,一方面也要有底气去面对各方质疑与挑战。在绝望中不能不自知,但也不要完全放弃。推想不是以后见之明倒推,

而是回到过去的某一个起点,产生一种平行的想象与叙述,成为一种推动与改变的力量。我联想到的是骆以军等人的小说,它反映出的是一种双向的思辨,这是我对引言中应然与实然话题的回应。

我更喜欢《赛先生在当代》的下编,因为它离我们的生活最近。这里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科学与技术的不加区分,同时还涉及媒介研究与文本细读。这就让这本书在调度这四个层面时,略微有些贪多嚼不烂。这并不全然是一个缺点,而恰恰是当代的复杂性导致的。另外,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定义其实可以更进一步,如果借用宋明炜的说法,当代是一种巴洛克式的回旋,是时空的折叠,它回溯的东西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时间观,当代人总是生活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之中。

我还特别喜欢书中对比僵尸文学与小冰写诗的部分,并从中总结了数据主义、超人文主义与解放潜能的集中创造力范式。其中再次谈到了数据主义时代里语言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人文学者的老本行。我举个例子说明语言怎样去规范AI。AI运用词汇时,已经是在运用幻想的方式,调用引譬连类的方法。我觉得是语言和文学本身并没有从科技脱节出来,它一再地、反复地把自己植入新产生的叙述能量中,或者是科技的产品和概念里面去。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种怪物性在里面的,只有通过语言进行表述和阐释之后,才能被纳入社会语境、社会论述之中产生可被认知的东西。只要我们还是血肉之躯,那么我们就必须去使用语言。这样的思考层面,并非要僵化语言的能力,或者片面强调语言的可能性,而恰恰是回到中国传统之中。王德威老师一再讨论“文”的定义不只是语言,它介于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之间,它也不是西方定义的文学,它是普遍的网络或者模式。所以我们在谈文的时候,应当回到这样的层面,它不仅仅是物质的,现在谈得不够的,就是文本本身的虚拟性,我觉得《赛先生在当代》下编似乎是想触及这样的意思,可以再进一步说清楚。

引言里还谈及“情境化”,我在想情境化对应的英文是什么? Context 还是 Situation? 我自己最近在关注西南边地研究,对于族裔族群会

比较关注。陈楸帆有一本《山歌海谣》讨论科技植入边民或者是边地族群的时候,会产生怎么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谈情境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华夷之辨的边界。在这些地方,赛先生或者是科学本身还没有被我们学者完全论述清楚。

樊迎春(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讲师):首先,李静老师博士论文《改革中国的“赛先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文化中的科学话语》对我而言是很好的工具书,对当代“科学”概念的流变做了很好的梳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她增补改写的《赛先生在当代》处理的是科学进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生活的问题,即她前面所说的社会化过程。关于这本书的研究方法,我很认同钱理群老师在序言中的概括,就是讲述科学与文学的故事,是李静老师一直以来采用的与脚下大地相交融的研究方法。李静老师把她参与当下新媒体活动的经验、对日常生活的观察都变成了研究课题,呈现了学术研究的理想状态。这是我非常羡慕的。

其次,这本书给我一种越界感,不只是科学与文学的交叉,更是“科学”概念的扩充,拓宽了它的边缘与界限。科学作为分科之学,翻译自日本学者。中国文化传统中与“科学”类似的是“格致学”,比如朱子理学中的格物致知,强调认知事物、理解规律后实现自我的复归。严复说:“富强之基,本诸格致。”梁启超则写出《格致学沿革考》,将格致学区分为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形而上学和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形而下学。这些区分已经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从格致学到科学,我们的讨论从理学的自我安置这一类哲学问题,走向了更为外在、客观的现代学科。在《赛先生在当代》中,李静老师从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写起,谈及管理科学、强人政治、干群关系等问题,其中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掌握人的思想感情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门科学”。在此意义上,晚清以来的那种格致学的概念,又发生了非常大的变迁。很多学者讨论过蒋子龙所写的“关系学”的问题,关系学其实不完全是贬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补充,而非截然对立。在第三章的讨论中,我不断在寻找围绕刘心武《班主任》的讨论与赛先生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对“又红

又专”的科学逻辑的探讨,但我的另外的理解是,《班主任》涉及了教育科学的问题。从管理科学、关系学到教育科学,直至陈景润科学偶像的塑造,呈现了“科学”如何逐步去建构并拓展了自身的内涵与外延。“科学”背后是新时期一整套社会秩序的重建,以及对这一重建过程的反思。“科学”不只是一个学科概念,更是历史与政治概念。

最后,我想谈自己同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得到的启发。我很喜欢横跨上下编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我特别理解这种切分,即“改革中国”与“当下中国”的区分,但更撞击我心灵的是那句“科幻界一直为承认而斗争”,但我们今天都知道,科幻研究已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这就触及了背后的时代问题,文学进入现实的方式不断发生着微妙却根本的变化,这在下编的个案中都有体现。我将之理解为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说的社会参与的重要问题。所以,“赛先生”在当代为何值得思考?以赛先生之眼去看待当代中国,到底能看到怎样的风景?这风景中,不只是科学带来的媒介与环境之变,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给予文学、生活与人的影响,以及人的反应。文学和科学的碰撞终究指向人的思维变化、人对于社会的参与程度以及审美方式的变迁。或许赛先生到底叫什么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以他为中间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讨论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复杂问题。

四、理解历史逻辑,贴近世态人心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是《赛先生在当代》最早的读者之一,其中一些章节这些年陆续读过,有一篇还是我责编过的文章,所以读起来很亲切。这本书的选题非常好,里面涉及的问题其实非常多,几乎每个章节都敞开了一个全新的问题,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思路,因此也感觉很难从总体上去把握它。有时也会觉得文本细读的沿途风景太美好,但会忘掉出发时的任务,丧失掉总体性。今天我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一章,也就是全书的第一章来展开对话。《赛先生在当代》的起点选在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但往前追溯,这样一种工业文学的逻辑,是建立在20世纪50—70年代工业文学逻辑崩溃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想补充一下20世纪60—70年代文艺中的科学故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1959年出版了一本书《上海解放10年》,其中有篇文章《工人阶级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里面谈到上海铜仁合金厂做了一件特别厉害的事,生产出了遭西方禁运的“锰铜丝”。但这里不是要展示奇迹,而是要强调全厂职工敢想敢干,将劳动和技术结合起来,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通过刻苦钻研和大胆创造,真正让工人阶级做科学技术的主人,这是整个“十七年”工业题材文艺的关键观念。“十七年”文艺中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设置两组相对的人物:一边是秉承群众路线的党委书记和满腔热情的工人积极分子;另外一边是迷信科学、仰仗技术理性、自私冷漠的厂长、技术知识分子、工程师或是教授,后者往往都是有待教育的反面人物。两组人物之间会围绕两种路线展开斗争,这是故事的标配。比如电影《桥》《无穷的潜力》《返老还童》就很典型。《返老还童》提供了一个隐喻,社会主义实践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造,需要工人阶级的创造力突破西方现代性的知识框架。这种设置体现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规定性,体现了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作为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利用激情政治来克服匮乏,克服科学理性的局限。所以,只能用人民的冲天干劲,用火热的激情来疗救冷漠的技术理性,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这是社会主义时代工业的宿命,也是《乔厂长上任记》展开的背景。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展开了一种新的想象,如李静在文中所分析的党委书记石敢,变成一个不能说话的哑巴的形象,特别有意味。现代科技的人格化是童贞,而乔厂长则代表了现代化的开拓精神,组成了三位一体的黄金战队,促成了工厂的变革。此时所批判的正是“十七年”的工业逻辑,反对用政治的办法管理经济,提倡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乔厂长上任记》里的反面人物是平庸的政工干部,正面人物是热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厂长,将曾经的价值谱系颠倒过来了。厂长使用科

学管理取代群众动员,改写了工业政治,拥抱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鞍钢宪法重返马钢宪法,过去被批判甚至被试图超越的外国技术与现代科学圭臬,又重新被奉为圭臬。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正是在这样一种后冷战的环境中建构为常识乃至真理。所以我想在这里补充《乔厂长上任记》的前史,这也是“赛先生在当代”的一个重要环节。除了李静在书中提及的赛先生、赛小姐、赛菩萨,还有没有“赛落后分子”这样一个层面,去牵引出“十七年”的历史脉络?这是我找到的一种对话方式,随后会在书评里继续展开。

闫作雷(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我也是《赛先生在当代》较早的读者之一,书的上编脱胎于李静老师的博士论文《改革中国的“赛先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文化中的科学话语》,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特意对照了一下博士论文与书的差别。刚才徐刚老师的精彩补充,恰好是李静老师博士论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在博士论文中所要处理的不光是科学,而且有教育这一块,但是我拿到书之后发现这部分没有了。另外,书的上编也不是放在新时期文学的起点,而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这让我想到当时有篇被经常提到的很著名的文献,我觉得与工业题材小说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恩格斯的《论权威》,特别是在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的时候提得特别多。为什么《论权威》在1975年被着重提及,因为这篇文章是反对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对权威的否定的,所以在1975年的时候,会特别用这篇文章去投射现实:国家太乱,工厂里面要有管理,由此通向改革。李静老师在处理《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的时候,让我想到书中后记里,她提到的自己成长在医院的单位大院,这种生命经验处于《乔厂长上任记》的延长线上。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当时还是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时代的体制,比如说保留了企业办社会,保留了大院模式,这与后来的完全市场化很不相同。所以很多论述里其实夹杂了李静老师的个人生命经验。

我读《“科学家英雄”的诞生及其后果》这

一章时,想到近年来媒体塑造的北大数学家韦东奕。书中指出作家与科学家共享一套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从陈景润到韦东奕,其中有一条自洽的逻辑,他们可以在纯粹的数学世界中获得快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绩效社会的考核下,许多人会感到困惑、焦虑抑郁甚至自我价值感比较低。李静老师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去讨论科学家的人生值不值得过,或者说强调文学家教导我们何为有意义的人生,而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弥漫性的奠基力量。我们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应该怎样去适应社会的运行规则,我觉得这是下编要处理的问题。

书名叫《赛先生在当代》,方式比较巧,并没有特别界定赛先生是什么,或者说并未严格区分科学和技术。自然科学和技术在一般理解中是有区别的,而书中是把科技作为绩效社会中的弥漫性力量来看待的。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说,人类利用科学改造自然,同时自然会报复人类社会,报复的方式就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程度有多深,报复的方式就有多狠,就会回报给人类一个更专制的社会。我认为这是李静老师一直关注的问题,在绩效社会中,强主体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弱主体的。从毛泽东时代的群众科学,或者说刚才徐刚老师讲的人民是科学技术的主人,是如何变成当下这种被技术改造、干预和修订的生活状态,是《赛先生在当代》关注的焦点,在书的下编得到了详细阐释。比如分析诗歌微信公众号的一章,就把当代的主体状态说得很好,我读完之后很有体会。另外李静老师还有一篇分析老树画画和小林漫画的文章没被收录在书中,我觉得是处于同一脉络的,涉及在宰治性的力量面前,主体如何去回应。

李静老师提供了两种回应方式:其一,独自疗愈,独自解决,回到自我;其二,走出个人局限,与他人和社会联结。后一种思路也是这些年比较常见的,建立一个小团体抱团取暖,也让我们想到“五四”之后的小社团改革等。但是把个人重新嵌入一个大的共同体中时,仍然存在个体如何安放自我的问题,李静老师也没有给出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主要是把困惑和思考呈现出来。这本书揭示了主体塑造的各种微观运作机制,很贴切也很深入,对当代文化经验的深

入挖掘正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王都(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赛先生在当代》包含了对于文学和科学关系的讨论,以及对于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的现实生活和情感世界的关注,这和我自己的兴趣相关,让我感到无比亲切。比如说书中第五章对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发生的科文之争的讨论,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从中国科幻文学研究的整个脉络来看的话,这场论争其实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国科幻小说以文学性为本体的基本观念。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以科普为目的和范式的“十七年”科幻小说的遮蔽。这场论争的观念和脉络,在第五章得到了非常公允清晰的梳理。

这本书处理了 10 个个案,和科幻相关的内容就占了三章,而且横跨上下两篇,同时我觉得其实也成为一条连接这本书所关心的科学技术摆脱又红又专的框架之后,迅速升格的两个时期的贯穿性线索。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显示出了李静老师对于科幻这种类型文学的偏爱,另一方面又像第六章的副标题提示的一样,无论是科幻文学的创作的膨胀,还是科幻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都意味着这种文学类型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某种意义上最具创造性和生产力的文化场域。在这个意义上,科幻研究在这本书中所占的比重,也一定程度地表征了当下文化产业格局的新变动。如果我们重新回到书中三章科幻研究,可以看到它们各具方法论意义。第四章是对科幻作品的文本细读,第五章是对科幻事件的历史化梳理,第六章是对科幻研究的提纲挈领的范式说明。也就是说,这三章在不同层次上展开,可被视为当代科幻研究的方法示范。

不过,这次我在整体性阅读这本书时,发现另外一个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范畴,就是“人心”。科学观念及其叙事如何在与公众的互动中重构了中国人的价值系统和道德观念,如何形塑了当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我觉得这是李静老师这本书的核心关切和方法论自觉。用李静老师自己的话来说,科学观念只有转化为一套面向公众的行动机制与主体召唤术,被注入温度与价值以及强烈的道德感,才有可能搅动中国

文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旧有价值系统,有机参与进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赛先生的社会化进程是这本书研究的对象,而赛先生想要进入人心,则需要借助文学的中介完成自我的叙事化。在此意义上,《赛先生在当代》这本书对于微软小冰写诗、僵尸文学、诗歌微信公众号生产机制的分析,对弹幕版四大名著的口语性和社群性的讨论等,都意味着科学的社会化进程,同时也孕育了一种新的社会化的文学性的生成。这种对科学和文学之间互动关系的讨论,以及对于一种新的文学性的阐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体会。

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产生了一种十分复杂和奇特的体验。一方面李静老师在这本书当中寻求的对象,某种程度上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会重视的那些在语言形式和审美层面有特异性开创性的文本,而更多是一种边缘的类型文学和网络时代的文化现象。这在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我们原来的那些文学研究的范式。也就是说在学院里面习得的那些文学史的知识 and 文学研究的规范,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新现象和新对象,其中需要做某种创造性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本书也做出了很有意义的示范。比如说第九章对于弹幕版四大名著的分析,既有对新兴的网络社群文化兴起的文化史的梳理,也有对发弹幕这样一种电子社群的口头语言的形式分析与文本细读;既有对B站青年的社会处境和心理困境的细致的体贴,也有对弹幕文化侵蚀日常语言,互联网媒介对公众生命状态的不良影响的批判性反思,这样一种综合的研究视野其实贯穿了整本书,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这本书构建新的批评路径的实验。这既带有李静老师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我觉得其实同时也是对一种新的批评生态的召唤。

另一方面,我自己是一个重度的B站使用者以及科幻的票友,所以无论是《小灵通漫游未来》还是弹幕版四大名著、鲁迅的表情包等,对于我来说都非常亲切,这些都是我自己和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在日常的交往和娱乐生活当中就会接触到的东西,然后我常常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作为文章的研究对

象代入进去。很多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似乎这本书研究的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书中对于一些案例的呈现,我觉得是十分生动并且是非常准确的。它不仅切实地描摹了网络时代青年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内在轮廓,而且也能够从中看出研究者即李静老师对于这些话题的热衷和热情。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感想。

第三点,让我更感到启发的,其实是一种持续不息的言说与参与现实的现场感和介入性。如何让学术研究生长出能够与现实生活的联通点,其实一直让我倍感困惑和困扰。李静老师试图在这本书中将研究者的生命体验、问题意识注入现实生活与脚下的大地。借书中的话来说,归根结底是以文学为主战场,同时打通社会、科学与历史等多重领域,致力从人文视角汲取与表述现代中国人如何在种种强力面前培育创造力与主动性。也就是说正视与现实的关系,恰恰是能够让我们的学术从现实那里获得自律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赛先生在当代》所期待和追求的是一种作为生产者的介入性的研究伦理。这或许不仅对现当代文学本身的范式更新有着某种参考价值,更对作为具体的人的研究者如何重建与现实世界的具身关系提供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经验。

最后,我想用一个可能不是巧合的巧合来结束我的发言。第五章的末尾,李静老师引用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话——摊开双手,伸出十指,去发现和塑造一个全新的现实世界——借此说明当代中国科幻具有的丰富的潜能。恰好《赛先生在当代》也有十个章节,正是在这十个章节的缝隙间,我们能够看到钱理群老师在序言当中所说的人文研究的光芒与可能。

五、数据无法穿透的“人文学”

李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感谢七位老师的高见,最后我再作一点简短的回应。确实如作雷老师所说,《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脱胎于我的博士论文《改革中国的“赛先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文化中的科学话语》

(北京大学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博士论文有一个明确的起点与对话对象,即“文革”后期激进的科学文化形态,论文最开始的一章便是讨论“又红又专”的话语脉络,迎春老师刚才所讲的教育题材小说,正是在这样的对话关系中才出现的。因此,缺失掉这一部分,以及徐刚老师所讲的 50—70 年代的历史脉络,确实是一种遗憾。但我依然觉得目前这本书的形态,代表了我当下的研究兴趣,即把历史与现实密切绑定,将赛先生升格的两次关键时段并置到一起,叠加具有特定意涵的多地层的“当代”。这与我作为研究者、存在者的当下困惑是密不可分的:人文学者如何在一个科技—资本—政治的霸权性力量的支配下开展自己的工作?当然,对于升格的逻辑,目前是以科幻文体的升格作为表征来呈现的,言不尽意,我应当有更多明确的说明。

这也就涉及兰珺老师的担忧,人文学者有没有资格和能力讨论科技相关的话题?在我看来,不仅有,而且非常急迫。当科技开始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书写、思考、表达与参与的权力就更为重要。科学并非客观的,科学事实同样是被不断阐释与建构起来的,科学背后的权力结构必须加以重视。《赛先生在当代》以一种不成熟的形态,真诚邀请大家共同参与到事关生存的讨论中去。王都非常准确地触及批评新生态的话题,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执着于“怀疑的阐释学”,而是努力寻求学院与生活之间的有机关联,在研究中获得修复与滋养。由此可以延展到济舟老师所论的“文”的问题。如今我们面对前所未有的海量的“文”,它的真实性和唤起感被削弱。有朋友就跟我分享了他打游戏获得的成就感、参与感与专注感,这是他阅读和写作时未曾获得过的。文学建构世界的的能力,与其他表达方式比较起来,到底具备怎样的特征,到底如何以怪物的形态或者幽灵形态,弥散进日常生活,尚待持续的观察与思考。

大家对“赛先生”的提法很关注,这正是我调用这样一种文化譬喻、人格化符号的用心所在。这本书不是以“下定义”为前提展开的,毋宁说是借文学故事说明了科学的弹性的、驳杂的面孔。老师们围绕赛先生有许多发挥,比如“赛先生为什么不在中国”,赛老板,赛落后分子等,

这些都携带着大家各自的问题意识。但我最关心的,还是科学如何卸下政治性的制约力量,获取充分自主性的过程。各位老师提示的思考角度,我未来也会适当引入自己的研究主线中来。

最后,我还想回到大先老师最开始谈到的“不可还原”,因为我最近便有一次深刻的体会。2024 年我还出版了另一本书《审美测绘:新时代文学批评实践研究(2014—2024)》(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4 年版),对近十年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概念、话题与事件作出综合梳理。可想而知,在写作前期需要搜集与消化大量材料。因此,我想到使用 ChatGPT 来辅助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使用过后,我发现 ChatGPT 给出的关键词与我自己大量阅读材料得出的观感并无多大差别,但它的结论拼贴感集中,是一种非常“表面”的回答。因为它无法回答为何这十年间批评家胶着于这些话题,他们如何、为何构造这些命题,他们投射其中的欲望与焦虑是什么。而我作为批评现场中人,更深切地体会到“压在纸背的心情”。经过这番试验后,我将研究重点从信息综述,转向对于批评机制、批评心态的关注,去思考那些无法被数据穿透的部分。人文学者都在焦虑自己的工作如何不被 AI 取代,那么在“不可还原”的意义上,在“文”的虚构性与叙事力量,在历史偶然性与时态人心的层面,人文学者有着广阔的工作空间与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的论坛就是很好的起点,愿我们一道努力,再次感谢。

【本次工作坊得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中间美术馆的大力支持,谨此向曾诚总编与卢迎华馆长致谢。本文内容已由所有发言人审定。】

【作者简介】李静,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化批评,著有《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等;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等等。